



猫头鹰学术译丛



沉默的另一面

〔印度〕布塔利亚·乌瓦什 著
马爱农 译



MAO TOU YING XUE SHU YI CONG



猫头鹰学术译丛

沉默的另一面

〔印度〕布塔利亚·乌瓦什 著

马爱农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URVASHI BUTALIA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Penguin Books India Ltd. 19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另一面/(印)乌瓦什著;马爱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10

(猫头鹰学术译丛)

书名原文: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ISBN 7-02-003431-4

I. 沉… II. ①乌…②马… III. ①印巴分治-研
究②印度-现代史-研究③巴基斯坦-现代史-研究 IV. K3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055 号

责任编辑: 胡允桓 责任校对: 王玉川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印制: 李 博

沉默的另一面

Chenmo De Ling Yi Mian

[印度]布塔利亚·乌瓦什 著

马爱农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5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431-4/B·211

定价 16.00 元

“猫头鹰学术译丛”总序

与大多数以西方经典和当代理论为主的译丛不同,“猫头鹰学术译丛”收录的著作主要涉及有关边缘区域的社会政治、灾难历史和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在过去二十年中,南亚、南美、非洲和其他边缘地区,几乎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消失了,若干讨论集中在全球化问题、西方的挑战和东方的回应问题、欧美的模式和中国的选择问题,以及为数不多的有关东欧和东南亚的经验等等方面。也有学者谈论非洲国家、亚洲国家、南美国家的社会生活和发展状况,但数量有限,也很少引起公众和知识分子的注意。至少从知识的角度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的开放,从而我们有关“全球”的知识其实只是关于全球某些中心地区的知识罢了。远的不用说了,就是许多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韩国等相对发达国家除外)的情况,我们也所知不多。然而,正如这套译丛所力图展示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经验,那里的成就、灾难、痛苦和欢乐是现代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关心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命运的人,不可能无视这一巨大而丰饶的存在。

但这套丛书收录的也不仅是关于当代世界的边缘区域的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它还包括了一些有关西方社会或称发达社会的经

验的研究。这是因为边缘化不仅发生在地理空间的意义上,也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内部。因此,这些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另一面、现代化过程的另一面,也需要纳入视野之中。当这些“另一面”成为我们有关全球的知识有机部分的时候,一个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一个更为开阔地看待我们所处的社会的世界视野,也就有可能呈现出来。

早在上个世纪的初叶,当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地从欧洲的经验中寻找变革的资源的时候,鲁迅和他的同伴们就曾经倡导过翻译和介绍那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他们把这看作是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的一个部分,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极为重要的部分。在从事这类翻译和介绍工作的过程中,这些先行者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视野,反思地看待在世界范围和中国范围内发生的变化。这个被逐渐淡忘的传统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球化这个字眼吸引了众多的讨论和关注的时候,这样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对于更为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思考。这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动力。

汪 晖

2001年7月25日

中文版序言

1947年,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后,印度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新的国度产生了,庆典固然隆重讲究,现代印度的所有历史,也以立国这一刻为分水岭。然而,独立并非没有代价。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分而治之政策怂恿下,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已有一段时间相互倾轧,当时两大政党——印度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被认为代表两方教徒的利益。实际上是否这样,今天仍然争议很大,但两党确实被认为代表两个不同群体。这些歧异和分立,终于导致人们要求把国家一分为二,让穆斯林教徒有自己的国家。这个要求呼声日高,后来,英国人同意,各国政治领袖也接纳。分治成为印度为独立付出的代价。

代价非常沉重。一分为二,并非简单地把财产分作两份,而是一个更深的剝割——不仅家庭、亲友被分离,而且邻里一夜之间反目成仇,疯狂相互杀戮,纵火,强奸,导致说不尽的暴力和苦难。数以百万计的人遁逃离开家园,找寻自己的族群,以求安全的居所。分治,让一亿一千二百万人离开原来的家园,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潮。期间,一百万人死亡,超过十万妇女被强奸。时至今日,半个世纪过去了,分治的伤口还未愈合,伤疤仍殷红。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深深的猜疑和敌视,全都可以回溯到分治那一刻。

有关分治的历史,大都集中政治的层面,较少审视当中涉及的人们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也很少关注它在今日印、巴人民的生活中留下什么阴影。不过,尽管官方的历史不谈这些,但在分治幸存者

的家庭和社群内,故事口传下来;一段一段的经历,在重复被述说的过程中存活着。笔者用了超过十年的时间,访谈分治幸存者,追踪他们的故事,看看这次重大事件对于普通人、女人、儿童以及社会边缘社群——贱民,是什么意思。由此,尝试提出一些问题——历史是怎样书写的,内外之分是怎样制造的,记忆是什么性质。

尽管印度次大陆的分治是印度的事情,但意义却非常深远。在全球,似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无法解决政治问题时便进行分治。可是,是否把两批人的居处之地分隔开来,人与人之间的宗教、族群、种姓,性别等的分野,也便可以消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针对全球已进行过的分治(爱尔兰/英国、巴勒斯坦/以色列、南/北朝鲜、东/西德、前南斯拉夫等)进行研究,可以找出远远超出地理界域的意义和回响。

身为关注今日世界上日益增多的两极对立的作者,对于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感到特别高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分享我们的历史,可以有许多目的:协助我们学习和认识周围发生的事,让我们相互更为接近,让我们不再以为我们的某个经验是一个人、一个文化、一个民族所特有的。它让我们看到:同样的错误如何发生了又再发生;在全球各地,在不同国家,在不同状况下发生。它让我们审视本身的经验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可以开始学习怎样不去重复如分治般事件的野蛮和残暴。因此,有必要让我们的历史走出国界。对于我来说,这本书从印度跨境进入中国,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布塔利亚

2001年4月于新德里

(刘健芝译于香港)

沉默·家国历史·女人

布塔利亚在本书扉页援引了一名被访者的说话：“你以为听了录音带，真的有人会改变吗？……我不觉得有谁会因而改变……你以为这些录音带会令下一批统治者改变吗？”

面对这种质疑，布塔利亚只能道出她本人从事调查、访问、著述工作的动机：她并非要改写“大写的历史”，但她对于暴力厮杀伤残加害事件并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感到困惑；类似事件的一再发生，促使她想了解：同一社群以至同一家庭内同时存在施暴者与受害者，不同的人保持了不同性质的沉默，这种沉默装载了什么？压抑了什么？隐瞒了什么？倾诉了什么？她问：沉默的里面、沉默的下面、沉默的另一面，是什么？

的确，历史问题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我们活在从过去带过来的矛盾复杂关系所构成的现在，我们缠旋于当下的特定处境。如果我们不愿伤口化脓，不愿加害受害的历史反复重演，那么，我们有必要不断翻动历史，折腾记忆，把历史的“历”，化为行动，重行经历、跨越、犯扰，直面不忍卒睹的自身的和他人的创伤，通过对记忆中的缺口和破伤的阅读，打断塑造、生产主体的惯性作用，以期个人的、群体的改变可以发生。

布塔利亚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往来印、巴两地，深入访问了七十多人，其中包括她的舅父。他，选择留在 Lahore，当他的家人全部逃到印度；他，被兄姐们认定为贪图独占老家大宅而皈依异教；他，被妻儿视为永远的外人而孤独莫名；他一生充满断裂、矛盾、郁结。可是，在大历史的动荡中，他的际遇几乎微不足道。有人会

说,比他不幸的人,还多得是。然而,这个人的不幸和那个人的不幸,可以相比吗?可以比出孰轻孰重吗?——尽管不幸的剧变时刻似乎是大家共有的。

1947年8月14日午夜,尼赫鲁在印度制宪会议上充满激情地宣告:“很多年以前,我们曾发誓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是到了我们实现誓言的时候了,虽不是完全实现,也是基本上实现。在夜半钟声敲响之际,当世界还在酣睡中,印度就将醒着迎接生活和自由。……一个不幸的时代今日宣告结束,印度重新发现了自己。”当水银灯照着尼赫鲁庄严宣告“一个不幸的时代今日宣告结束”之际,在分治中被截成两半的旁遮普邦,千万人却在恐惧中迎接苦难和死亡。英国撤出的同时,是让“独立”孪生着“分治”。据估计,短短几个月内,一千二百万人逃亡,一百万人死亡,十万妇女被掳拐。

这些数字惊心动魄。几个月内一百万人死亡。这个人类史上的大悲剧发生之后,既不能归咎天灾,英、印、巴的统治者都似乎无须对此负责,因为英国交出了权力,印、巴两国分别由两大党接管了权力,两国也并没有动干戈。

那么,谁应对如此巨大的苦难负责?

再翻看历史,当权者表现出来的草率与轻心,难辞其咎。1947年6月3日,分治计划公布;6月30日,英国派拉德克利菲(Cyril Radcliffe)主持划分委员会,筹划具体划分工作,他在7月8日抵达印度。巴、印分别在8月14日、15日宣告建国,两国分界具体详情在8月16日才宣布。拉德克利夫接受访问时说:“我抵达时告诉所有政治领袖,我手上的时间很紧。但真纳、尼赫鲁、巴特等所有领袖都对我说,在8月15日前一定要一条线。于是我便给他们画了一条线。”

在地图上画一条线看上去漫不经心,轻而易举;英国殖民者以其老练的狡黠摆出中立姿态,俨然置身其外,冷眼旁观国大党与穆

斯林联盟展开对权力、财产、领土的明争暗斗。疆界的不确定,前途的未卜,使恐慌一下子降临;沿着宗教信仰为界分,印度教、锡克教人涌向印度,伊斯兰教人涌向巴基斯坦。上层进行权力移交,英国议会设立了十个委员会处理分治事项,全是关于工商军事的,完全没有处理老百姓的迁徙安置问题。落荒逃亡、患病挨饿、殴斗厮杀、掳拐妇女、集体强奸,成为不寻常时期中的寻常现象。地图上,是干干净净的一条线。

为政者不仁,令人心寒。可是,民众相残的这段血肉模糊的历史,不能不迫使我们追问:当年的反殖斗争如何孕育着不可思议的兄弟相残?世代千百年共处,共用同一语言、同一乡土资源的社群,为何竟在旦夕之间劈分为两半?恐惧、暴力、毁灭的魔咒为何一时间紧箍着成千上万的人,使之既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妇女为何成为掳劫、强奸、占有的物品,成为对峙双方男人争相糟蹋、凌辱的对象?大批妇女为何不仅死在“敌人”刀下,也死在父兄手上?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家族、社群,为何大都讳言这段浸在血泊中的历史?怎样在寻常生活中挖出不寻常时期行为的根源?怎样避免历史悲剧一次一次重演?对于我们经历了不同灾难的人,这又有什么启示?

布塔利亚在书中提出上述问题,正是因为她从父母口中听到1947年的事变时,感觉并不强烈。可是,她亲身经历了犹如历史重演的一幕:1984年,甘地夫人被两名锡克教徒刺杀,激发起印度教徒对锡克教徒的报复性屠杀,三天内几千人遇害;1992年,印度境内又发生一轮屠杀回教徒的暴乱。杀戮、强奸、纵火的情景,简直是1947年的翻版。她无法不回望历史,以期找到思考和感受问题的线索;不是要找出清楚的答案,而是要打开缺口,暴露大写的历史所提供的现成答案,并不那么理所当然、舒服自在。突破有意无意的善忘,打断惯性,打开心眼,去观看过去从正面总是看不到的东西,这当中已包含了一种新体验的诞生,即看到“我”和一些似

乎擦不着边的东西的密切关连，“我”对一些原来不能接受的东西所应承担的责任。

于是，布塔利亚开始访问经历当年分治的人；大部分人不愿旧事重提。“他们问我，要在记忆中挖出已经抛在后面的过去，有什么用？每次遇到这个问题，我也会产生我的疑问：为什么人们这么不情愿回忆这个时期？是事情太恐怖了？还是，他们是这个历史的共犯，或起码某些人是这样？分治期间，难分‘好’人、‘坏’人；几乎每个家庭的历史里，都有暴力的受害者和施害者……”

布塔利亚带领读者审视分治期间普遍发生的一种情况——为了保护妇女不被“敌人”奸污，为了保护其贞节名誉，大批妇女或是被父兄亲手杀死，或是自行殉身。

曼加尔·辛格和两个兄弟亲手把家中十七个女人和儿童杀死的故事，家喻户晓。布塔利亚访问他时，他已年过七十，定居于Amritsar。他矢口否认家中妇孺是被杀害的：“离开家后，我们不得不渡过周围的水域。我们一家子有许多人，有几个妇女和孩子不可能游得过去，不可能活命逃生。所以我们杀死了我们的十七位亲人，十七条生命——他们成了殉难者……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他们感到痛苦，痛苦和悲伤，他们的痛苦，我们自己的痛苦。就这样，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出发了，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口吃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走。如果我们不走，就会被杀死，当时的情况是那么……害怕？我讲一件事情给你听吧。你知道锡克教这个种族吗？他们从来不会害怕，他们面对不幸毫无畏惧。那些人（那些被杀死的人）一点也不害怕。那天，他们从楼梯上下来，走进我们家的大院子，然后他们都坐下来，你可以让我们殉难——我们愿意成为殉难者，然后他们就殉难了。还有小孩子……有什么可害怕的呢？真正要害怕的是蒙受耻辱。如果他们被穆斯林抓去，我们的荣誉，他们的荣誉就会牺牲，就会丧失。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荣誉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自豪，就不会感

到害怕了。”

布塔利亚记述了多个类似的故事。妇女自杀或被亲人所杀的方式,有服毒、焚身、刀砍、绳勒、枪毙、焗死。在锡克教徒居住的Thoa Khalsa村,九十名女人集体投井自杀,仅三人获救。布塔利亚访问了幸存的巴桑特·考尔,她缕述当时情况:“我们聚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说我们宁死也不愿成为穆斯林。于是发给每个人一点儿白粉……我们村子里有个姑娘,她跟着穆斯林跑了。她长得很漂亮,大家都在担心,有一个已经跑了,他们会不会来把我们的姑娘都抓走……就这样,他们决定把姑娘们杀掉。……许多姑娘都被杀死了。然后那个拉贾万提大妈,她家里有一口井,就在菜园子里。我们大家都跳进了那个井里,大概有一百……八十四……有姑娘也有男孩子。我们都跳进去了。就连男孩子也跳进去了,不光有小男孩,还有半大小伙子。我也跳进去了,带着我的两个孩子,一起跳了进去……这就像你把饼子、面包放进圆筒泥炉,放得太满了,靠近炉子顶上的就烤不熟了,只好把它们拿出来。就是这样,井里太满了,我们没法淹死……孩子们也活了下去。后来,尼赫鲁去看了那口井,然后英国人就把它封上了,那口井里堆满了尸体。”

在当时以至几十年后,这类事件大都不被当事人(行凶者或被施害者)及其社群视作暴力事件,反而作为英雄事迹传颂。与此同时,许多被奸被掳的妇女大难不死回到家里后,却被视为耻辱。饱受蹂躏的女人回到家里,迎接她们的是这句话:“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死了会更好点儿。”

为什么暴力是这么炫目,却不被视为暴力,反而备受歌颂?为什么女人被强奸的恐惧变得这么实在,以致牺牲性命或手刃亲人在所不惜?这里,强奸远不是一个女人身体被一个男人侵犯的问题。丈夫对妻子施暴不被视为强奸,也不涉及名誉的问题;丈夫对妻子施暴的权利,有婚姻法律和社会伦理支持。一个女人被“外

人”强奸之所以被视为不仅污辱了个人的名誉,而且还有全家族、社群以至国家的名誉,也是由特定的政治和道德社会界定的。斯碧华(Gayatri Spivak)指出,“女人”成为一个“概念—隐喻”(concept—metaphor),作为工具,造就男人社群的团结,既是男人的“领土”,又是社群内权力的行使方式。

男人把持的社群身份由女人的纯洁和贞节来构造和凝聚,有它的历史渊源。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百多年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以宗教复兴主义为骨干;不论是印度教、回教还是锡克教,都把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生殖功能联系于民族国家大业的开展,联系于文化传统的保护;女人身体成为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男人集体的财产、反殖抗争的工具。

用以反抗殖民者的诉诸宗教传统、抽象女人身体、抹杀内部歧异的民族主义,同时播下了自我相残的种子,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究其原因,不能只怪英国殖民老手奸狡的挑拨离间。女人具体的身体和抽象的观念,提供了关键的钥匙,昭示民族主义的家国观念如何维持同一性又同时压制内部歧异。当两阵敌对冲突时,争相糟蹋和强奸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于社群的具体想象。许多报导揭示了分治期间敌对双方把女人身体切割残害的做法。女人不仅身体受摧残,更被家人、社群视为污秽之身,使家、国蒙羞,受害者成为被责难者。这种屈辱难以言说。

社会用以维持这种荣辱的,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有物质基础,就是家、国赖以维系的权力网络:它迫使一个女人被强奸后无法在家人和社群圈子内立足,它迫使因奸成孕产下的孩子被社会遗弃。这种权力关系是残暴然而无形的。无形的暴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称之为传统,在危机时期以腥红的血引人注目,危机过后恢复“常态”之时,无形的暴力继续存在于集体的失忆、失语之中。

在建构敌我对立时,荣辱一方面规范了女人的思行感受,将其置于屈从的关系中,另一方面又在民族的集体身份的叙述中,以女人的身体象征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要求的是牺牲“个人”的英雄主义。但百姓在日常生活面对着种种限制、匮乏和障碍,发展出复杂的存活网络。相对于存活复杂性所依赖的逻辑,荣辱的对立逻辑自然不能完全决定一切。

从劫后余生者的叙述来看,“就义”并不慷慨激昂,而是充满矛盾、焦灼、忧伤的。叙述中辛格两次以行动者主体出现时,话句突然中止,行动者改为女人们:“所以我们杀死了……他们做了殉难者”,“他们说:你们可以让我们殉难——我们愿意成为殉难者。”否认自己在杀戮中的刽子手角色,把自己降为女人意愿的顺从者,但失言时又暴露了残酷的事实:“所以我们杀死了……”辛格的叙述省略了手刃十七个家人的细节;忆述时杀戮情景出现的地方,只有省略号代表的一刻沉默,和重复出现的一个单词——“痛苦”。这个词凝聚了恐怖、惊栗、懊恼、悲哀。只有赋予“殉难者”的赞美,才能聊以自慰。

劫后余生的女人,表现的是另一种沉默。考尔的叙述,显示当时情景历历在目。叙述塞满了人物和行为,家族里哪个人杀了哪个人、怎样杀,都明确地铺陈,惟有叙述者带着似乎不为所动的旁观者口吻,连她自己跃身井中而未淹死的情节,也不带任何感情地道出,像说着别人的故事。对比辛格重复使用单词“痛苦”,考尔的叙述完全不表露个人感受。惟一出现的“担心”一词,是谈到村里一个女孩跟回教徒走了,“大家都在担心,有一个已经跑了,他们会不会来把我们的姑娘都抓走……就这样,他们决定把姑娘们杀掉。”这里,女孩子是“我们”的,决定及执行所有女孩子的死刑的是“他们”;“大家都在担心”的“大家”包括谁不包括谁,是含糊的。

女性的文化形象和行为规范,是谦逊和顺从;贞洁、名誉这些观念的内化,通过使女性依赖所处的社群所容许的存活方式而生

产并维持。从上、从外强加于她们的抽象的贞洁和名誉，内化后却成为她们的责任，是她们发挥主动性的领域，是她们确立自我的途径。于是，女人央求男人成全她们的牺牲，就如辛格和考尔叙述的许多女人一样。对于她们来说，家中男人不能保护她们过河或突围，对前途无把握，于是，保持贞洁以至整个集体的名誉，便是她们最能肯定的东西了。

可是，跟回教徒走的漂亮女孩，却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可以有其他选择，并非绝路一条。这个“坏榜样”如雷击般震撼整个社群，要在女孩子集体“背叛”的观念和行为萌芽之前把她们杀光。

从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看，为保“名誉”而殉身，并非女人的惟一选择，也非所有家庭都以名誉为重。个人的两难、挣扎、抉择的空间仍然存在。大量妇女被“掳拐”的故事，恰恰道出了女性在具体环境下所作的适应。

据报导，分治期间，有十万妇女被“掳拐”。对于印、巴两国政府来说，妇女被异教徒掳拐，被迫改奉异教，有失国体，因此，两国政府在1947年12月协议合作寻回“被拐妇女”。政府行为往往是一清二楚地划界的。印度在1949年通过一项《寻觅及拯救被拐人士法案》，界定所有在1947年3月1日以后与不同宗教的男人同居或发生关系的女人，都是“被拐人士”；这个日期以后所有婚姻无效。两国政府各派社会工作者和警察组成的“拯救团”，搜寻“被拐妇女”，然后交换，国会甚至讨论数目应否对等，犹如交换的是战俘。官方数字是，几年内寻回的被拐妇女有三万人。

拯救过程中出现了政府意想不到的情况。有妇女乐于被拯救回家，但也有妇女不愿被“拯救”。实际的情况很复杂：有些夫妻宗教不同但结合是自愿的；有些家庭逃亡前，为安全计把女儿交托给村内可信赖的异教友人或邻居；有些女人被拐后，结婚生子，不愿离去；有些女人认为家人不会接纳她们的“污秽”之身，所以不如留下。一些拯救队社工忆述当时的“怪异”情景：“被拐”妇女被寻获

但未送出境时,在营地外面,围着一大批哭啼的大胡子男人,哀求把妻子发还给他们,或让夫妻见最后一面;营内的女人千方百计要逃出去,与丈夫团聚;有些女人拒绝换回原来的衣服,坚持已皈依异教;更有些女人进行绝食抗议。

这些男人当中,有些在家国自保的机制下,可以拐劫、强奸别人的女人,灭杀自己的女人,但在不同的家国交易的机制下,又变了一个样。他们是“好人”?是“坏人”?至于女人,她们让我们看到鼓起勇气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虽然充满恐惧,但作出抉择、采取主动、突破“内”“外”疆界、摇撼既有价值的能力,却是家国纯洁同一之体所不能抽象抹杀的。抗衡政治、道德的抽象化,就要把感觉、痛楚、欲望、企盼还给血肉之躯。

以分治为主题著述小说的作家有不少,较闻名的有 Rajinder Singh Bedi、Qurratulain Hyder、Ismat Chughtai 等。笔者最喜爱的作家是曼都(Saadat Hasan Manto)。曼都是乌尔都语(Urdu)著名小说家,所写关于分治的小说,震撼人心。以下是两篇小小说:

同情

“求求你,不要在我眼前
杀死我的年轻的女儿……”
“好吧,就照他的话去做吧……
把她剥光
把她拖走……”

遗憾

刀
划破胃
直达阴茎
睡裤裤带切断了

拿着刀的人

惊异地

呼喊

犹如念咒驱邪

“吱吱吱……我做错了。”

另一篇《打开》，写的是一对父女的故事。年迈的父亲带着女儿莎奇娜横过边界；到了另一边，女儿不见了，父亲请求八名年轻的男志愿者协助寻亲。年轻人又友善又热情，在树林找到惊恐的美丽的莎奇娜，描述她父亲的嘱咐，莎奇娜才愿意跟他们爬上吉普车。她没有披肩，颇为尴尬，不断用手掩盖胸部。

下一个场景是一间诊所。一个似无生命的躯体被担架抬进来，父亲认出是女儿，懵然跟着“尸体”进入医生诊室。里面闷热，医生指着窗口喊说：“打开！”

“尸体”一动，两手移向裤头，艰难地要打开。老父兴奋大喊：“我女儿还活着……我女儿还活着！”医生大汗淋漓。

小说没有对暴力的正面描述。是谁把害羞的莎奇娜糟蹋，故事没有直说，但读者可以猜出，正是那几名四出拯救“自己人”的年轻志愿男子。危难时期的“敌”“我”，对于女人来说，难以确定。可是，莎奇娜已无法说出谁是她的恩人敌人。在诊所里，她丧失了言语、识别的能力，惟余下的，是对男声喝令的下意识反应，呼喊读者进入她打开了的残损的躯壳，想象、感受她经历了的一切，聆听她无法言说的控诉。

人类学者达斯（Veena Das）最初解读这小说，认为父亲与女儿分居在两个世界，父亲把女儿身体的一动误读为生命，哪知女儿生犹如死。可是，细想之下，达斯又改变了看法：当整个社会的父权观念是贞节高于一切，当女儿被奸戕的身体昭然示众，这个父亲仍只有一个愿望——愿望女儿活着；他的兴奋的呼喊，把女儿拉回他